

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

——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

唐 睿

提 要

1987年，盧瑋鑾教授於報刊系統介紹香港文學地景和文學篇章，為香港文學散步（Literature Tour）奠下了學理的起點。2001年，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開始舉辦全港性的大型文學散步，此後不斷續辦，活動內容亦不斷發展，除了文學散步，還包含文學創作分享，以及文學創作教育，逐步演化成一項系統地建構“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的活動。另一方面，香港其他文藝機構於過去二十年間亦不斷提倡書寫香港社區，發展出許多極具規模的文學地景建構活動，跟研究中心的文學散步，性質相通。2016年，香港文學生活館策劃了“島敘可能：文學×視藝”活動，為文學地景的建構方式，注入跨媒體元素。過去十年，“文學地景”建構活動在香港蔚為風氣，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在華文地區，尚屬特殊。然而此現象的發展脈絡，至今尚未獲得系統梳理，而此由文學散步蛻變而來的過程，亦值得從身份意識的角度加以探究。本文將藉文獻史料，分析文學散步轉化成文學地景建構活動的過程；再以法國學者：相伯德羅浮、莫里斯·霍布瓦克和皮埃爾·諾亞有關身份意識和集體回憶的理論，分析文學散步及文學地景建構活動，對建構個人身份意識的意義。

關鍵詞：文學散步 文學地景 地誌文學 集體回憶 身份意識

引 言

1987年,盧瑋鑾教授於《星島日報·星橋》系統介紹一系列以蔡元培、魯迅、許地山、戴望舒和蕭紅為主題的文章,文章集中介紹與五位文化名人相關的香港文學地景、歷史文化掌故和文學篇章。這些文章,後來編輯成《香港文學散步》一書,成為香港文學散步的重要參考,亦為香港文學散步奠下了系統、堅實且具學理的基礎。除了撰文,盧教授還身體力行,為市政局、大學,以及教育署帶隊,親身導賞文學散步。2001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開始舉辦全港性大型文學散步,即由盧教授領隊,自此之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就不斷與政府、文化及教育機構合作,續辦文學散步,並且不斷優化活動內容。文學散步的性質,亦愈來愈豐富,除了專門追訪文化名人足跡,還請來本地學者、作家、教育工作者,通過散步來作分享文學創作、文學教育及創意寫作教育的經驗,並鼓勵參加者將散步經驗昇華成文學創作作品。在這些內容當中,文學創作的部分,實際是在推動“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的創作,至於活動通過考察“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閱讀和創作地誌文學,實際就是在不斷疊加文學地景的內涵與價值。從這角度而言,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自2001年籌辦至今的全港性大型文學散步,亦可被視為一項橫跨了十六個年頭的大型文學地景建構活動。

除了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其他文藝機構,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電臺和香港文學生活館,在過去近二十年間,也不斷提倡書寫香港社區,這些文藝機構有時與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作,有時則獨力籌備活動,推出多個閱讀及創作香港地誌文學的活動。2016年,香港文學生活館策劃的“島敘可能:文學×視藝”展覽,更為文學地景的建構方式,注入了跨媒體元素。活動通過閱讀、寫作和遊覽,深化不同文學地景的內涵和價值,同時又鼓勵創作者以香港不同地區為題材創作,建構文學地景,為香港的地誌文學發展,增添姿彩。

廣義而言,但凡有文學作品書寫某個地方,都可算得上是一次文學地景的

建構。建構文學地景本來並非什麼嶄新的文學現象，但像香港過去近二十年這樣，不斷由不同文藝團體組織活動去建構文學地景的現象，則可謂特殊。此現象由一些獨立的文藝活動所構成，各活動之間，亦沒有任何文藝理論去支持或指導，然而各活動最終展現出一些相似甚至相同的文藝取向，尤其是對香港文學，對本地地景的推崇，這實際亦揭示了香港過去近二十年間，文藝精神中愈來愈強的本土意識。分析近年文學散步活動的轉變，以及建構文學地景的現象，對探討近年香港文學和社會發展，都具備相當的參考價值。

本文首先將討論地景與身份意識建構的關係，然後再對歷屆不同的文學散步作分類，探討不同類型文學散步的特點、討論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與地誌文學的差別，分析不同本位的文學散步，在邀請參與者創作時，實際所觸及的文體類型；最後本文將分析文學散步的參與者，如何通過書寫地誌文學、建構文學地景，並最終產生出一種建構自我身份的意識。

一、地景與身份意識的建構

文學作品，特別是一些觸及獨特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以及集體記憶的作品，往往會激起讀者的身份意識，以及對身份的反思。身份意識、集體記憶以及文學地景三者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係，而三者的互動關係，則可以從相伯德羅浮（Chombart De Lauwe）、莫里斯·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和皮埃爾·諾亞（Pierre Nora）三位法國學者的主張得到說明。

對於“身份”，法國社會學家保羅-亨利·相伯德羅浮在他 1983 年出版的《文化與權力：社會變遷與嶄新表述》（*La culture et le pouvoir: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et expressions novatrices*）一書裏，下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定義：

當一個個體獲得一個身份，他會藉著一個名字將他與其他的區別開，當他擁有往事和自我意識，當他承擔他的責任，他就成爲一個人。通過發展他的先天潛能，以及積累愈來愈廣博的經驗和知識，並從所屬社會而獲得社交生活，他建構出一種人格……個人的相對自主性，以

及人格的形成,只有通過與他人建立的關係以及集體的社會組織,才得以確立。¹

相伯德羅浮的定義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人的身份必須以社會組織的集體為基礎,另一點就是,確立個人身份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往事”(Histoire²)。人的自我意識,是由“往事”——自身的經歷來確立,亦即“記憶”。“記憶”包含一己經歷的個人記憶,此外還包含自己對所屬群體的記憶,亦即“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哲學家莫里斯·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認為,個人記憶裏面,實際包含著一個社會層面的記憶,兩種記憶並不割裂,而是互相依從。個人之所以會編織有關過去的印象,其實是為了通過社會來定義自己。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則在晚年著作《記憶、歷史、遺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一書裏指出,霍布瓦克的核心觀點大致可以歸納成一句話:為了記起,我們需要別人。個人記憶首先會仔細分析自己在所屬群體的經驗,根據它從他人所獲得的基本信息,然後才被建構出來。³正如霍布瓦克在他的《集體回憶》(*La Mémoire collective*)所寫的那樣:“如果集體回憶在一群人之中能產生力量和產生延續性,那實際是因為,群體中的每個個體在憶記著他們成員。我們可以理所當地說,每個個體的記憶,都是集體回憶中的一個觀點,而這個觀點又會因著地點,因著我與群體當中其他人的關係轉變而改變。”⁴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亞則將霍布瓦克的觀點應用到歷史的領域,並編撰寫成一套幾冊的《記憶的地域》(*Les lieux de mémoire*)。通過這套書,諾亞嘗試梳理出地域與記憶的關係。

-
- 1 筆者轉譯自 Chombart De Lauwe, *La culture et le pouvoir: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et expressions novatrices*, Paris, L'Harmattan, 1983. pp. 74—75.
 - 2 法語中的“Histoire”同時包括“往事”、“故事”和“歷史”等意。
 - 3 筆者轉譯自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Seuil, 2000, pp. 147—148.
 - 4 筆者轉譯自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p. 94—95.

《記憶的地域》源自諾亞於 1984—1992 年的研究計劃，當時諾亞與同事為法國的一些紀念性地點定位，並作系統列表，探討幾百年間，這些地點所盛載的集體記憶，如何在法國的民衆間產生影響。有別於傳統的歷史田野調查，諾亞與團體的工作重點不在考古，而是在於考查民衆對歷史的印象。相比起歷史真相，人們對各個歷史事件的印象，才是真正溝通著人與過去的媒介，才是這次歷史考察的基本素材。諾亞與他的研究人員除了考察具體的歷史遺址，還特別關注一些非物質的歷史事物，例如環法單車賽和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

諾亞和同伴希望通過考察，可以梳理一些連結著法國人感情、精神價值的場所。這些場所包含了法國文化的本質和法國人的身份意識，而諾亞的研究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探討這些地方怎樣演變成法國民衆集體記憶的結晶。例如上面提及的環法單車賽和《馬賽進行曲》，它們雖然都是一些非物質文化，却跟一些現實的地點緊扣連，此外還扣連著一些特定的歷史時空。

這正好呼應了霍布瓦克有關集體記憶的其中一個核心理論：構成人當下身份的核心，其實就是過去的記憶，特別是集體記憶。人通過有形或無形的文化遺產地標，去把握某些特定的時空，塑造出個人對於過去的印象，而當不同的人在群體中藉由相同的紀念物，去把握某些特定的時空，就建構出各種集體回憶。集體回憶構成了個人記憶中的社會層面，定義了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關係，成為建構個人身份的重要憑據，產生身份認同的效用。時空本來並不具備特殊的意義，一個地域之所以產生意義，又或者說，早期人類為地域劃出界綫，釐清不同地域的概念，實際乃出於人類對個人依附之空間的記述，亦即身份的思考。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諾亞所指的“空間”(L'espace)和“地點”(Le lieu)具有特殊的含意。諾亞的“空間”可以想象為一張留有人類活動痕迹的白紙，人類通過各種活動在這張紙上留下了形形式式的記號、文字、語彙和情感，經過這些人為的“加工”，“空間”變成了“地點”(Le Lieu)，而當“地點”積澱了集體記憶，最終就會變成了“地景”(Le paysage)。民間的共同記憶以及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跟“地景”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成了

民衆對某個地域產生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而由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和流動性都較物質文化遺址高,所以它們在建構集體回憶、身份認同的功效,亦較物質文化遺址大。

結合相伯德羅浮、霍布瓦希和諾亞等學者的觀點,可以整理出幾項原則:

1. 人的身份意識由回憶建構。
2. 代表着社會群體層面的集體回憶,又在記憶之中,對人的身份意識,起著關鍵的作用。
3. 集體回憶往往跟“地景”有關,建基於“地景”之上。
4. “地景”並不單單指具體的文化、歷史遺址,它同時亦由非物質文化來盛載,例如人物傳記、音樂、文學。
5. 因此,非物質文化如何建構“地景”,對社會集體如何去建構集體回憶,以及對個人如何去建構身份意識,起著關鍵的作用。

換言之,文學,作為非物質文化,它如何建構“地景”,將影響到讀者對某個時間、空間的集體記憶印象,繼而影響到讀者的身份意識建構。

文學作品中的“地景”建構,主要通過寫作和閱讀兩方面。正如諾亞所言,當一個“空間”通過文字、結合創作者的情感被描述、被書寫,就成了“地點”,而當文學作品中的“地點”得到一再閱讀,被經典化——例如以教科書教材、名著,或者一些集體運動所肯定並傳閱的讀物,這些文學作品中的“地點”,就會因為積澱了人類群體的集體記憶,而由“地點”就變成“地景”,例如黃河、長江、松花江、西湖、黃鶴樓,以及咸亨酒店等,這些“地景”除了聯繫著讀者對一些時代的記憶,同時亦關係到讀者的身份認同。

這種由文本、集體回憶、“地景”交織出的身份認同關係,在歷史相對較短的香港文學中亦同樣存在,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例,香港作家如舒巷城,加上屬於第二代移民的香港作家,例如也斯、西西等作家開始集中以香港的街道、生活為題材創作,就將香港文學中的本土意識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隨著這些作家和作品的價值得到肯定,並且被不斷閱讀,以及逐步經典化,他們筆下的土瓜灣、鯉

魚門、筲箕灣、北角碼頭、新蒲崗等“地點”，亦因為積澱了相當的香港集體回憶，而變成了“地景”，並確立了不少香港讀者身份認同中的本土意識。

除了文本，一些與“地景”關係密切的文學活動，例如以“地景”為主題的徵文比賽、講座、展覽、讀書會、朗誦會、研討會，以及文學散步（Literature tour），都一樣能夠通過依附在“地景”的集體回憶來建構參與者的身份意識。香港過去近二十年，正正就出現了許多與本土“地景”相關的文學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參與者須要直面“地景”所盛載的集體記憶，並對身份認同的問題作出反思。

在過去接近二十年，香港眾多的文學活動中，文學散步就在閱讀和創作兩方面，建構和深化了不少香港文學“地景”，並對香港讀者的本土身份認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不同本位的文學散步

香港首次比較大型的文學散步，於 2001 年 2 月 11 日舉行，但這次文學散步的源頭，可以上溯至 1987 年。1987 年 5 月 4 日中文大學的小思老師（盧瑋鑾教授）於《星島日報·星橋》開始刊登一系列以蔡元培、魯迅、許地山、戴望舒和蕭紅為主題的文章，文章集中介紹幾位文化人與香港的關係，尤其是眾人在香港的足跡。通過這些介紹，盧教授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實際是個具備歷史和文化的地方，而香港的年輕一代，實在應該繼續傳承過去的文化。盧教授後來將《星島日報》上的文章輯成《香港文學散步》一書，而在 1991 年出版這書的時候，盧教授在序裏特別所提到：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歷史，又或許有些人忘記了。

自清末以來，原來不少著名的文化人，都曾踏足香港。他們可能只是路過，却同時也散播著文學、文藝及文化的種籽。這些學者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往往被歷史遺忘了，但這種遺忘，對他們、對香港來說，都很不公平。⁵

5 小思：《香港文學散步》（新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i。

爲了更有效地將這種觀念傳播出去，盧教授決定以“文學散步”的方式，親身帶參與者走訪各個盛載著文學史記憶的地景，期望通過“現場感”，強化學生對前人以及前人事迹的認知，而更重要的，就是產生“感情”。2001年2月11日，盧教授爲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校本課程(中學)組，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帶隊，擔任文學散步導賞嘉賓，帶領包括在中文大學修讀“香港文學散步”課的百餘位學生，到香港島散步，追尋二十世紀20至40年代，香港的文學活動記憶。是次活動的形式，亦成了日後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續辦文學散步的濫觴。

2008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電臺合辦了“香港文學行腳”，再續2001年的文學散步計劃。是次活動繼承了2001年文學散步的精神，冀望讓參與者通過散步，加深參與者對作品以及文學事件的認知與情意。有別於2001年“香港文學散步”，2008年的文學散步，主辦單位在上述目標之外，還希望通過活動，讓幾位導賞作家：小思、葉輝、陳智德、王良和、陳汗、胡燕青、劉偉成，與參與者分享他們的創作經歷和足跡，換言之，是次文學散步的內涵，加入了創作分享的成分，因此2008年的文學散步，在本質上與前一屆略有不同。

2008年文學散步的本質轉變，還見於另一個地方，那就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爲參與者準備的參考書目。每次文學散步，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都會建議一些參考作品供參與者參考，歷屆列表的編輯和分類邏輯都不盡相同，它們除了供參與者了解地景，同時亦透露了歷屆籌備者對文學散步本質意義的反思。2008年的參考作品，就跟2001年的有著明顯差異，首個差別就在於，2008的參考清單，輯錄了幾位導賞作家以導賞地區爲題材的作品，供參與者通過文本、實地考察，以及跟作家的直接互動，深入了解篇章，從而對篇章的創作過程，有較爲全面的了解；第二個差別則是，2008年的大部分參考作品，都是具有明確香港本土意識的香港文學作品。上述兩個特點並非偶然，因爲只要將2008年文學散步的活動內容跟之後一屆——2010年的“香港文學行腳”的相對照，就會發現2010年的文學散步在文學賞析、文學史研習，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的比重，都較2008年輕，但風俗文化以及歷史考察的成分，則較2008屆重。這種差異，明顯跟兩屆

文學散步的籌辦理念有著緊密關係。2008 年的文學散步，旨在：

嘗試邀請知名作家及學者帶領讀者翻越文本扉頁，走入大街小巷，用眼睛和耳朵觸摸以文字繪畫的人文風景，探索他們的構思背景和寫作歷程，從中解構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體味香港作家筆下的城市傳奇，感受作品中的地方情懷。⁶

而 2008 年文學散步的參考作品列表，亦以其兩個特點呼應著該年的活動目標。這兩個特點分別是：1. 作品以香港文學為主；2. 列表包含了導賞作家以導賞地點為題材的作品。

至於 2010 年文學散步的目標，則是：

由知名作家及學者作導賞，尋覓作家筆下的香港地方風貌，藉著細讀文學和歷史文化的篇章，回望香港走過的歲月，追尋香港的地景風物在時代變遷當中的印記。⁷

若從 2008 年和 2010 年兩屆導賞嘉賓的專業來作對比，就更能看出兩屆活動的側重點各有不同：

年 度	導 賞 員	地 區
2008	小思、陳智德 陳汗、王良和 葉輝、胡燕青、劉偉成	城市行——灣仔 山水行——沙田及大埔 懷舊行——中西
2010	劉偉成、丁新豹 葉輝、廖迪生 徐振邦、蕭國健	電車軌迹——香港島 郊野風光——大澳 圍村風情——屏山

2008 年的七位導賞嘉賓，都是具備資深文學創作經驗的純文學作家；至於 2010

6 <http://rthk9.rthk.hk/elearning/littour/>.

7 <http://rthk9.rthk.hk/elearning/littour2010/background.htm>.

年的六位導賞者中,丁新豹、蕭國健和廖迪生三位教授以及徐振邦先生四位,其著述主要都是以香港史、香港風俗研究為題材。因此,2010年的文學散步,在籌辦的基礎上已明顯較2008年一屆,具有更濃厚的歷史、風俗考察意味,2010年的文學散步,雖然仍由文學貫穿整個活動,有不少觸及文學史、文學創作的地方,但文學作品在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以歷史風俗載體的身份,退居到二綫的位置,跟2001年和2008年兩屆文學本位色彩較為濃厚,冀望通過文學作品、散步來讓參與者認識文學史及文學創作的文學散步相比,2010年文學散步的本質,則可說是屬於歷史、風俗考察本位。

三、“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與 “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

2011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作,再次為文學散步計劃注入了新元素,對文學散步的發展,產生了幾方面的意義。首要意義是,2011年的文學散步計劃,重點討論了文學散步與文學教育的問題,將文學散步帶入了文學教育的領域;第二個意義則是,通過製作港、九、新界的“文學景點地圖”,進一步探討了文學散步的文學本位問題;至於第三個意義是,藉著整理參考篇章的選用原則,劃開了“地誌書寫”與“地誌文學”的差別。

2011年的文學散步計劃名為“走進香港文學風景”,可說承接了2001年及2008年的兩次文學散步計劃,呈現出濃厚的文學本位色彩,建構成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文學本位的文學散步傳統。計劃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又由兩個環節組成,第一環節由盧瑋鑾教授與中學生就著“文學情懷與本土關注”為題來作對談;第二環節則由導賞員於對談之後,帶領參加者參觀中大校園文學景點。至於“走進香港文學風景”的第二部分,則是“分區文學景點導賞設計工作坊”。活動旨在與香港文學教育工作者分享“文學景點導賞”的設計方法,分析文學景點與文學作品的連綴點,說明文學散步將如何協助學生深入賞析文學作品。

另一方面,在繼承文學本位的文學散步傳統的同時,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亦繼續發展以歷史、風俗考察為本位的文學散步。2012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電台第三度合辦“香港文學行腳”,以承接2010的“行腳”。2012年的“行腳”,雖然也有純文學作家擔任導賞,但活動的設計框架,主要還是通過文學篇章去印證香港歷史及社會變遷。2012年的“行腳”由三次散步組成,分別命名為:“調景嶺今昔”、“遊九龍寨城”和“香港仔變遷”,從這些名稱就能看出,散步的路綫設計,都是圍繞著三個富有濃厚歷史價值的社區,而散步的重點,乃在於認識社區的歷史變遷。至於文學作品,則主要扮演認識歷史變遷的媒介,正如活動的簡介所說:

尋覓作家筆下的地景蹤迹,從詩、文、故事的文字銘刻,感受香港歷經歲月流逝的滄海桑田,並置地閱讀文學作品和地景,無疑是認識一個城市發展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切身的情感體驗,喚起書寫的力量。⁸

2012年的活動雖然以歷史、風俗考察為本位,但有一點頗為值得注意,就是參考作品清單的分類。對照2008年、2010年和2012年三次“行腳”的參考作品,可以發現,2008屆的參考作品主要是純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大都能以傳統的文學文體分類劃分為新詩、散文、小說。而跟2008年具有濃厚香港文學本位的“行腳”相比,2010年文學散步的參考書目在新詩、散文和小說三項文學文體之外,加上了一項“書冊”的分類,將一些歷史、文化、風俗研究的著作,輯錄其中。及至2012年,“行腳”的參考作品清單則又再起變化,清單除了沿用小說和詩歌的文體分類外,還加入了(戲劇)劇本這項新的文體;此外,“文章”則取代了“散文”,從而可以以更廣泛的定義,將更多地景書寫的文章納入列表之中,而2010年的“書冊”分類,到了2012年,則取消了,並由“地方研究”及“歷史掌故”所取代。

⁸ <http://rthk9.rthk.hk/elearning/littour2012/intro.htm>.

2008年、2010年、2012年文學散步參考作品⁹：

年度	文體	作 品	作 者
2008	新詩 新詩 新詩 散文 小說 散文 新詩 散文 散文 散文	禮拜日 灣仔老街 灣仔老街(之五) 話說灣仔 蝦球傳(節錄) 原始的蘇絲黃世界 蕭頓球場的黃昏 修頓球場的神秘 東方、英京 灣仔的幾間戲院	鷗外鷗 陳智德 陳智德 小思 黃谷柳 張尙任 黃雨 何紫 小思 馬家輝
2010	小說 散文(部分) 書冊 詩歌	胭脂扣(節錄) 色,戒(節錄) 北角之夜 電車 電車的旅程 電車樂 春園街的春園 電車叮叮記趣 叮叮! 電車之旅 630 電車之旅 北角之夜 車中懷遠人 電車 西環夜	李碧華 張愛玲 葉輝 小思 也斯 羅永光 葉靈鳳 吳羊璧 何耀生 李碧華 陳滅 馬博良 胡燕青 林夕
2012	小說 文章 地方研究	五·吟哦與詠唱 日落調景嶺 半下流社會 日落調景嶺 調景嶺 調景嶺這一年 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 五十四·遷拆調景嶺 第四章·中國巨變下的香港 調景嶺歲月	鍾玲玲 林蔭 趙滋藩 鄧仲文 鍾玲玲 黃熾明 梁家麟 亞洲電視新聞新資訊科 (編著) 陳天權

9 文體的分類方法,皆沿用自三屆文學散步參考清單之分類。

文體分類的轉變，顯示文學散步的主辦單位，愈來愈在意“地誌書寫”與“地誌文學”的區別。

地誌書寫是一種較為寬泛的文類定義，它涵蓋了各種以“地方”(Place)作為書寫中心的文字，例如遊記、地理報告、地方風俗考察、旅行日誌、旅人書信、軍事戰略調查等，這些文字不一定具備豐富的文學藝術價值，但一般都具有相當的現實功能。¹⁰至於“地誌文學”，則是指一些以地方為主題和題材的文學作品。¹¹雖然“地方”在地誌文學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地誌文學與其他地誌書寫存在一定的距離，除了文學藝術的價值差異外，地誌文學還較其他地誌書寫更為強調作者的“地方感”，特別是作者對地方的主觀感情，這就跟一些講究客觀記錄、具有科普性質的地誌書寫，在寫作的出發點上存在差異。閱讀地誌文學的趣味，往往就是細味作者對某個地方的“地方感”，以及作品賦予相關地方——“文學地景”的內涵。同一地方，從地誌書寫和地誌文學的向度去審視，將會釋出不同的訊息和內涵，例如往昔坐落於太子道西的浴德池，從地誌書寫的角度言，它是香港史上首間上海浴堂，亦是油尖旺區掌故裏，曾經有許多名人出入的文化地標；而作為文學地景，它則是盛載了李碧華小說——《霸王別姬》兩個主角無盡唏噓的傷心地。又如幾屆文學散步皆有造訪的灣仔區，從地誌書寫的角度，它是殖民地政府早期，華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也是英軍的軍事基地；而坐落在海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既是中英交接香港政權的場所，也是每年舉行香港書展的場地。然而，作為文學地景，灣仔却是《蘇絲黃的世界》裏，包含著西方人視角中，具有濃厚東方異國情調的煙花之地。

自 2001 年開始直到 2012 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不斷探索文學散步的可能模式，五次的文學散步計劃，逐步建構成兩種文學散步的傳統。2001、2008 以及 2011 三屆皆屬於文學本位的文學散步，活動集中以地誌文學的角度去選取參考作品，散步旨在深度探挖文學篇章中文學地景的內涵。至於 2010 及 2012

10 詳見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11 “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指一些描寫地方，專門以某個地方為題材和主題的文學作品。詳見 Robert Arnold Aubin, *Topographical Poetry in XVIII-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0).

兩屆文學散步，則屬於歷史、風俗考察本位的文學散步傳統，活動主要以地誌寫作的角度來解讀參考清單的文學作品，而 2010 年及 2012 年的散步目的，則旨在借散步和篇章來加深參與者對考察地區的歷史、文化認識。

當然，文學散步是一種開放性很高的活動，若從教育角度言，它更是一項涉及多元智能的跨學科活動，不同的文學散步，事實上皆可擁有多元目標，活動設計者可視乎活動目標，活用文學作品，結合考察地點，讓參加者獲得各種認知經驗。不同本位，不同模式的文學散步都有其重要性，彼此之間實際並無高低之分。不過由於本文的關注點集中在文學散步如何作為一種文學創作經驗，鼓勵參與者去建構文學地景，因此下文將把焦點集中在文學本位的文學散步去加以討論。

四、從文學散步到建構文學地景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於 2001、2008 以及 2011 三屆的文學散步，都具有較為鮮明的文學本位色彩，然而三屆散步在內容和目標上仍各有不同。2001 年首屆大型文學散步，目的在於追蹤考察幾位文化名人在香港的足跡，藉著散步，讓參與者認識香港一直遭到忽略的文化記憶與歷史。活動通過文本與地景互證，以及參與者親身遊歷的“現場感”，讓參與者對文學史、文學作品產生一種更為個人，更為深刻的認識，而這種形式的文學散步，亦即歐美地區頗為流行的文學散步形式。

2008 年的文學散步，在沿襲 2001 年散步的主要目標之外，增加了文學創作分享的元素。2001 年文學散步所介紹的作家具已作古，而 2008 年的文學散步則相反，專門邀請了幾位當代香港作家與參與者互動。2008 年的散步由幾位香港作家負責導賞，所選的文章，亦包括了導賞作家以遊覽地為題材的作品，導賞作家帶領參與者遊覽自己寫作的街區，感受當地的地方情懷，通過與作家互動，了解作家創作作品的靈感泉源、構思背景，以及寫作歷程。相較 2001 年，那種以考察文學史、作家生平和文化記憶為中心的文學散步，2008 年這種包含創作分享，寫作教育的文學散步，則較為稀罕。

至於2011年的文學散步，則在文化歷史考察、文學創作分享之外，加入了文學教育分享的元素。該年的文學散步計劃，由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辦，計劃對象，除了學生，還包括現職教師。該年的文學散步計劃，特別希望透過工作坊，協助中國語文科教師設計“香港文學景點行程”，並提供教學素材建議。計劃除了散步、作家分享，還邀請了中國語文科老師分享教學經驗。當時大會還專門按香港、九龍、新界各地區的文學地景製作了“文學地景地圖”以及“文學景點篇目”，供參與者參考。“文學地景地圖”與“文學景點篇目”所選的篇章，以純文學為主，重點突出香港各區的文學地景，跟過去幾屆文學散步的參考作品清單相比，具有整理香港文學地景的重要意義。

從追蹤文化歷史足跡到注入文學創作分享和文學教育元素，這種轉化除了是主辦單位對文學散步模式不斷探索的結果，也與香港文學教育的政策發展有關。2003年9月，香港中學實施新修訂的中六中國文學課程，以及2009年推行的高中中國文學課程，均要求學生從事文學創作。為了配合課程，大部分學校開始開設文學創作課，然而不少語文老師的文學創作經驗有限，因此極需要坊間具有資深文學創作和擁有教授文學創作能力的作家支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文學散步，主要對象是中學生，因此無論是2008年，邀請七位資深作家和教育方家為導賞的文學散步，抑或2011年專門在活動中加入了文學教育分享的元素，都殊非偶然。

自2001年的文學散步起，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文學散步，雖然大都沒有要求參與者在散步後為參觀的地方撰文，但這並不代表文學散步缺乏文學創作的指導和分享。如前所述，2001年至2012年之間，有幾屆由香港作家負責導賞的文學散步，就以分享創作經驗為活動的目標；而即使是歷史、風俗考察本位的文學散步，往往亦會有一些寫作的活動互相呼應。以2010年的文學散步為例，當年的散步實際是由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公共圖書館，和香港電台合辦，而這一年的文學散步，也同時是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的一項活動。該屆文學節同時亦舉辦了一項名為“感悟城市脈動”的徵文比賽，比賽的背景如下：

比賽設中學組及公開組,參賽者以自身對城市生活的體驗,寫作不超過二千字的文章。“城市”並不限於香港,也可以是遊歷、求學、旅居、移居的地方,由抒發個人生活的情懷和觸感,到關於歷史、文化、民生、風俗、地標的人文關懷,乃至城市之間的參照對比,均可成篇參賽。¹²

雖然比賽並沒限制參賽者必須書寫香港,而截稿時間在2010年3月19日,恰恰就是在舉行文學散步的時間之前,但比賽所提倡的“關於歷史、文化、民生、風俗、地標的人文關懷”,則和2010年的文學行腳的設計完全對應。“感悟城市脈動”的獲獎文章於“第八屆香港文學節”,即2010年6月24日至7月11日期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正好承接住5月9日、29日及30日的三場文學散步,互相呼應。不難看到,兩個活動,實際都是以鼓勵參與者閱讀和寫作地誌書寫為目標。至於2012年的文學散步,它鼓勵參與者去創作的目標就更加明確,在活動的簡介部分,主辦單位已清楚說出活動的其中一個目標是通過“切身的感情體驗”,“喚起寫作力量”。由此可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所籌辦的文學散步,一直都跟文學創作息息相關。

2012年開始,文學創作在文學散步中的重要性更大為提升。在這一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除了繼續與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電台合辦“香港文學行腳”,還跟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等文化或教育機構,開展了“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共分兩個部分,一是“協助參與中學籌辦校本的‘文學景點考察’行程,二是舉辦‘香港文學夏令營’”¹³並於“2012/13學年,為五所中學策劃了五次考察,地區遍及香港島、九龍、新界,參與師生逾二百五十人”¹⁴及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將其中三條文學景點考察路綫的資料、同學作品,以及夏令營文學講座內容等資料,編成了《走進香港文學風景(卷

12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hklf/hklf8/event10_3.html.

1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合編:《走進香港文學風景(卷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研究中心,2014年),頁iv。

14 同上。

一)》一書。這本書,亦是日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為文學散步文章結集的里程碑。

自 2012 年的“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起,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開始在文學散步之後,邀請參與者為參觀地區創作一篇作品。中心收集作品之後,會請資深創作人點評,選出合適的篇章編輯成書。自 2012 年起,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共將文學散步的學員作品編成了《走進香港文學風景(卷一)》¹⁵、《輕鬆散步學中文(新界卷)》¹⁶、《輕鬆散步學中文(港九卷)》¹⁷、《少年文學私地圖》¹⁸等書,合共收錄中學生的地誌文學共 205 篇。除了學生佳作,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還在 2016 年,邀請文學散步的導賞作家¹⁹為導賞的地區撰文,共收十八篇以香港十八區為主題的文章,最後編輯成一套兩冊的《疊印》。

文學地景的構成,主要由地景被寫進文學作品開始,隨著文學作品一再被閱讀,文學地景的內涵與價值就會不斷地加深。例如在思果、余光中、小思、黃國彬等作家集中以馬料水、吐露港為題材創作之前,這些地點,尚未成為文學地景,但隨著這些作家不斷以之為創作題材,而作品又不斷地被閱讀,並引起新一代作家對這些山水的興趣,繼續以之為題材撰文,這些山水,就成了文學地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文學散步內容,早期以閱讀和實地考察為主,每當參與者閱讀和考察一個文學地景,該地景的內涵與價值就會獲得深化,對文學作品和地景,產生經典化的作用。而當文學散步開始邀請參與者去書寫考察地景的時候,其意思就更加深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在 2012 年至 2016 年的四年間,共催生了 223 篇香港地誌文學,涉及的文學地景更遍佈全港十八區,這在香港文學史上,相信仍是個特例。一些地誌文學也由於在歷屆的文學散步中被一再閱讀而被經典化,例如也斯的《新蒲崗的雨天》、《中午在鰂魚涌》、麥樹堅的《博愛醫院的大樹》、陳德錦的《憶昔圓萌》和鄧達智的《祠堂

15 收錄 2012 / 13 學年的文學散步佳作 65 篇。

16 收錄 2013 / 14 學年以新界區為題材的文學散步佳作 45 篇。

17 收錄 2013 / 14 學年以港九區為題材的文學散步佳作 45 篇。

18 收錄 2012 / 13 至 2015 / 16 學年,以全港各區為題材的文學散步佳作 50 篇。

19 不過書中有一位作者,並未為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導賞過文學散步。

的燈籠幽幽掛》等。一些過去未獲書寫過的地景，例如上環的“朱榮記”²⁰、旺角的梅馨書舍²¹、上水天光墟²²、荃灣運動場²³亦因為獲得記述到文學散步參與者的作品，而獲開發為新的文學地景。

除了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的其他文化機構，亦不時舉辦活動，鼓勵香港的地誌文學書寫。其中時間跨度比較長，規模比較大的，當數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它所主辦的香港文學節。每屆香港文學節，香港公共圖書館都會舉辦一次徵文比賽，雖然這些比賽的宗旨並沒有特別提及地誌文學，但比賽的要求及內容，往往都指向了地誌文學的書寫。例如2002年第四屆的“香港寫照”徵文比賽²⁴；2008年第七屆文學節裏，要求參賽者“選擇香港十八區其中一區為題材”、“內容可寫地方、人物、生活、風俗、事件或個人感受”²⁵的“香港地方風情”徵文比賽；2010年第八屆的“感悟城市脈動”徵文比賽以及2016年第十一屆，鼓勵參賽者“走進香港的後花園”、“須以書寫香港的郊野風光和自然風物”的“自然的律動”徵文比賽等，實際都具有鼓勵讀者去創作地誌文學的功能。

至於2012年成立的香港文學生活館，亦通過不同的活動，推動了香港的地誌文學書寫。例如2016年開始的“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就“以香港十八區作為核心，發動以上至作家社群、文學愛好者，下至青年學生及普羅大眾為對象的社區考察研究及書寫”²⁶，活動特別希望能夠“發掘庶民記憶，讓市民大眾社區的庶民價值，從中建立主體意識”和“推廣香港文學，讓市民閱讀到書寫他們社區的文學作品，從中汲取文學知識及情懷”，亦即通過讀和寫兩方面來推廣香港的地誌文學。

20 馬輝洪、樊善標主編：《少年文學私地圖》（香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6年），頁134—139。

21 同上，頁28—31。

22 同上，頁49。

23 馬輝洪、樊善標主編：《輕鬆散步學中文（新界卷）》（香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5年），頁192—194。俗稱楊屋道運動場，2008年開始被拆卸。

24 從當年得獎作品的標題，即能看出得獎篇章不少都屬於地誌文學：如劉綺華《藝林書室》、沈岩《梅雲理髮室》、李紹基《眾坊街阿發》、徐妙玲《解讀鳴寮街》。

25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hklf/hklf7/b5_events_details920c.html?eid=33&cid=10.

26 <http://writinghk.org/intro/targets/>.

自“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推出以來，已徵集到 100 篇具質量的稿件，另外加上“作家在社區”，即邀請作家為社區撰寫的 17 篇稿，整個活動，截至目前，共收集了 117 篇香港地誌文學²⁷，數量十分可觀。

除了“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香港文學生活館還於 2016 年舉辦了一個備受注目的，與地誌文學相關的活動：“島敘可能：文學×視藝”展覽。活動邀請六位作者，各搭配一位本地藝術家同遊一個指定的香港島嶼，隨後作者須將自己對該島的印象，創作成文章。與一般由作家自發產生創作動機的創作經驗不同，“島敘可能”是一次刻意安排的創作經驗，作家的創作動機由活動而起，而作家的創作過程則相對自由，只要符合一些最基本的創作條件，如以所分配的島嶼為創作主題；作品須具有與視覺作品對話的功能，而最後作品亦須與視覺作品一併展出。雖然在“島敘可能”的計劃目標裏，並沒有特別注明要通過活動建構文學地景，但活動實際上却達到了主動建構文學地景的效果。它的性質跟文學散步基本相同，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島敘可能”較其他的文學散步，增添了跨媒體元素，而更重要的是，“島敘可能”的地景，是由活動主辦單位首先訂定，然後再邀請作家與藝術家造訪，最後創作作品並佈置成展覽。活動的設計可說扭轉了傳統文學地景的建構邏輯，傳統文學地景的建構，往往是由作家造訪地點開始，然後根據感受創作文章，並在文章中將地點建構成文學地景。在傳統文學地景的建構邏輯裏，作家的創作動機和建構地景的過程，是自發的，而作者建構地景的目的，可以是隨機地出於性情，亦可能是刻意地為求達到某種目標；而“島敘可能”的實驗寫作方式則說明，作家建構地景，可以說是他發的，而地景的建構，更是可以組織、可以安排的。如果按照本文第一部分的觀點：地景是建構集體記憶的基礎，而集體記憶又是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參照，那就是說，個人身份認同，亦可以通過有組織或者刻意安排的地景書寫而建構出來。

通過上述概念來審視文學散步，就會發現，每當文學散步的參與者通過參

27 “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仍在徵稿，只要有具質量的合適稿件，香港文學生活館就會將之上載到活動的網頁，因此篇章的總數仍會不斷增加。

觀、閱讀和寫作來深化或建構文學地景，他們事實上也同時在通過探索文化地標來追尋和建構集體回憶，並且尋問自我身份。盧瑋鑾教授最初在《星島日報》介紹文學地景和組織文學散步的初衷，正正就是希望讓參與者記起清末以來著名文化人“被歷史遺忘了”的事跡，而這種喚起，並不是抽離的研究，而是通過“現場感”來強化“同學對那些人或那件事的認知，更重要的是產生了感情”²⁸的經驗，換言之，盧教授期待文學散步能讓參與者造訪一些帶有文化印記、盛載著集體回憶的地景，進而產生主觀情感的連結，然而這種連結並不是活動的終點。當文學散步的參與者跟文學地景交匯，那就意味著他們也同時與一種文化印記、集體回憶交匯，而在這個交匯的過程，文學散步的參與者都須面對這些文學地景上的文化印記，換言之，就在接觸文學地景的瞬間，文學散步的參與者都必然經歷了一次身份建構的過程，例如2001年的文學散步，觸及的文學地景，都跟中國近代的幾位文化名人、文學大師相關，於是活動對於參與者的意義，在認識近代歷史、文學之外，還多了一層與近代中國相關的身份思考。同樣原則落在2008年的文學散步，由於該年所觸及的文學地景帶有強烈的本土文學色彩，於是活動對於參與者，亦會引起一份本土身份認同的反思。

結 語

過去近二十年，香港出現了不少與文學地景相關的文藝活動，文藝機構組織這些活動，或出於喚起公眾對歷史的記憶，或出於推廣文學閱讀和創作，或者回應教育政策和前綫老師的需要，以及鼓勵公眾關心所在的城市……但無論活動舉辦的初衷如何，一旦活動觸及文學地景，就無可避免地推動參與者去直面文化地景所包含的文化印記、集體回憶，以及身份認同問題。儘管文藝機構組織文學活動的決定，往往是基於多方面的考量，其中更經常受到非文學的因素——例如資金撥款、行政代價、社會認同等條件制約，但如果在近二十年

28 同註1。

間,香港不同的文藝機構都同時對本土的文學地景產生興趣,而且持續不斷動員人力物力,組織相關活動,那麼恐怕並不能簡單將之歸結為巧合,而是基於一種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傾向。這種現象以及現象背後所折射出的香港社會精神,還有參與者在參與文學地景相關活動後所撰寫的文章,在在都反映了參與者的個人身份思考,值得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學者深入探討。香港近年本土意識高漲,其中一個原因,就涉及身份認同的問題。面對如此複雜的社會、政治問題,近二十年的地景文學以及文學地景的建構過程,或多或少,也有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示。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小思：《香港文學散步(新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系統合編：《走進香港文學風景(卷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研究中心,2014年。

馬輝洪、樊善標主編：《輕鬆散步學中文(新界卷)》。香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5年。

馬輝洪、樊善標主編：《輕鬆散步學中文(港九卷)》。香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5年。

馬輝洪、樊善標主編：《少年文學私地圖》。香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著：《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著：《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

二、法文

Chombart De Lauwe, *La culture et le pouvoir: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et expressions novatrices*, Paris, L'Harmattan, 1983.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Seuil, 2000.

三、英文

Hillis Miller ; *Topograph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Robert Arnold Aubin, *Topographical Poetry in XVIII-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0).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Landscapes : From Literary Walking Tours to Building Literary Landscapes

TONG Yu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87, Professor Lu Wei-luan introduced the Hong Kong Literary Landscape and literary writings in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which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Hong Kong Literary Walking Tours. In 2001,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ok the lead in organizing territory-wide Literary Walking Tours, and thereafter developed and enhanced the activities with diversified content. As well as Literary Walking Tours, a platform for the sharing of experie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the programme also evolved and became a mov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Landscape.”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some literary and ar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promoting community writing and setting out to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Landscape” activities on a large scale, aiming to share the same objectives of Literary Walking Tour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In 2016, The Hous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hosted an exhibition titled “Islands’ Narrative: Literature X Visual Art,” which infused the pattern of Literary Landscape Construction with transmedia elements.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Landscap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a vogue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unique phenomenon in Chinese writing has

drawn scholars' attention from overseas because of the massive scale and overwhelming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activities. Nonetheles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henomenon makes it a worthwhile project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Literary Walking Tou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task in two steps. First, with reference to literary and documentary sources,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Walking Tours' evolu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Landscape." Second, making use of the theories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memory proposed by French scholars Chombart de Lauwe, Maurice Halbwachs, and Pierre Nora, it analyzes the Literary Walking Tours and "Literary Landscape Construction" movements, which may yield significant finding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of one's identity.

Keywords: literature tour, literary landscape, topographical literature, collective memory,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